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研究丛刊

龚书铎 主编

清代理学史

下卷

张昭军 著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研究丛刊

龚书铎 主编

清代理学史

下卷

张昭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理学史. 下/龚书铎主编; 张昭军著. —广州:
广东教育出版社, 2007. 1

(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研究丛刊)

ISBN 978 - 7 - 5406 - 6535 - 7

I. 清… II. ①龚…②张… III. 理学—思想史—
清代 IV. B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4967 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 - 15 楼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网址: <http://www.gjs.cn>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)

889 毫米×1194 毫米 32 开本 49.5 印张 1 080 000 字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06 - 6535 - 7

总定价: 120.00 元 (上卷、中卷、下卷)

质量监督电话: 020 -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: 020 - 34120440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教育出版社

目录

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学术格局

- 一 社会剧变与清政府学术文化政策的调整 ... 2
- 二 西学传播与传统学术格局的变化 23

第二章 道光时期的程朱理学

- 一 理学复兴的契机 52
- 二 宗理学者趋于活跃 61
- 三 “修史辨学” 74
- 四 学术思想的变化 96

第三章 咸同时期的程朱理学

- 一 咸同政局下的理学人士 112
- 二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156
- 三 倭仁的理学思想 179

第四章 光宣时期的程朱理学

- 一 社会变动与理学衰落 198
- 二 宗理学者式微 226
- 三 学术史编修 239
- 四 方宗诚、贺瑞麟的理学思想 249

第五章 晚清时期的陆王心学

- 一 陆王心学的复苏 274
- 二 晚清时期的心学思想 298

第六章 晚清理学与汉学、今文经学

- 一 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攻诘与调和 354
- 二 宗汉学者对宋学的兼采与会通 383
- 三 宗今文经学者对宋学的吸纳与否定 406

第七章 晚清理学与西学、新学

- 一 新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440
- 二 宗理学者对西学（新学）的排斥与汲取 ... 453

第八章 晚清理学与社会文化

- 一 程朱理学与纲常名教 484
- 二 科举、教育与程朱理学 508
- 三 程朱理学与文学 530

结语

- 一 晚清时期理学的特点 550
- 二 晚清时期理学的地位及影响 556

主要参考文献	561
重要人名、书名索引	585
后 记	623
《清代理学史》书后	625



第

一

章

晚清时期的文化政策 与学术格局

晚清时期，封建王朝危机四伏，加上西风东渐，中国固有社会性质、阶级结构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。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，中国封建主义旧文化陷入严重困境。尽管清政府采取种种政策，力图摆脱困境，但就整体趋势而言，并未能阻止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衰落。

一 社会剧变与清政府学术文化政策的调整

清政府的学术文化政策与社会变动密切相关。大体说来，自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迄清朝灭亡，清政府的学术文化政策虽屡有调整，但可以中日甲午战争分为两段：此前主要是强调崇儒重道、崇正辟邪，极力强化程朱理学的地位，同时又不废汉学；此后在实用层面上不得不重视西学的价值，主张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

（一）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的学术文化政策

道光朝以降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危机并未有任何好转，反而是旧患新忧，日趋严重。这一时期，阶级矛盾空前恶化，不仅白莲教反清起义余波未平，而且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、捻军起义，无以聊生的下层民众揭竿而起，直欲推翻清王朝的统治。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，不少人道德沦落，好利忘义，不能胜任拱卫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。当时官场腐败，士习堕落，“驯至有邪民，无

正士”^①。因此，强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，压制反清思想的传播，恢复纲常礼义秩序，依然是清政府学术文化政策的重要任务。

清入关以后接受汉族文化，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。至康熙年间，清朝崇儒重道的统治思想已非常明确，程朱理学被确定为官方哲学。康熙帝还以程朱理学为指导，制定《圣谕》十六条，作为人心教化的基本准则。雍正帝执政后，将《圣谕》十六条扩充为《圣谕广训》万余言。乾隆、嘉庆年间，汉学成为显学，程朱理学虽仍居官方哲学地位，但趋于衰颓。道光朝以后，清统治者出于挽救危局的需要，继续提倡和强化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。

道光帝登极后，鉴于当时世道人心的衰落，多次谕令正学术以敦士习，敦士习以端民风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御史俞焜奏请严核优劣以端士习，道光帝借机发布上谕，称：“从来民风之醇朴，由于士习之端谨。凡有教士之责者，不徒课以文艺，务在敦崇实行，严为旌别，以树风声。”^② 清政府要求各督抚、府尹、学政严饬地方官暨各教职，务须随时训诫，认真稽查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，道光帝诏告各级官吏，切实采取措施，广为宣传《圣谕广训》，以导民向善。上谕说：

向例各直省地方官朔望宣讲《圣谕广训》，俾乡曲愚民皆知向善，良法美意，允宜永远遵行；惟州县地方辽阔，宣讲仍虑未周。嗣后各学政到任，即恭书刊刻，颁行各学生童，令人人得以诵习。并著翰林院敬谨推阐《圣谕》内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，拟撰有韵之文进呈，候朕钦定，飭各学政一并恭书，遍颁乡塾，俾

^①黄爵滋：《综核名实疏》，《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》卷四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。

^②刘锦藻编：《学校》四，《皇朝续文献通考》卷九十七，光绪年间刻本。

民间童年诵习，潜移默化，以敦风俗而正人心。^①

何绍基代其父所作《道州重修学宫记》对道光帝的崇儒重道政策也有记载：“今天子以儒术治天下，扶世励教。……近岁崇祀孔庙，而海内各行省若州县往往修饰学宫，创废兴坠，以仰应天子崇儒重道之意。”^② 汤金钊则说：“圣朝重道崇儒，振兴学校，以化民成俗，虽在遐陬僻壤，罔不横经鼓篋奉至圣为依归。”^③ 清政府通过从祀孔庙、修建学宫等举措来加以积极鼓励。

咸丰年间，各种社会矛盾更为尖锐。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由金田出发，迅速据有大片地区，直逼京师，对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严重威胁。这场起义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冲击，令整个统治阶层惊恐万分，视之如心腹大患。曾国藩称：“此岂独我大清之变，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，我孔子、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！”^④ 清统治者在武力镇压的同时，加紧强化思想文化统治，实施“崇正黜邪”之策。道光三十年十二月（1851年1月），咸丰帝继位不久，两江总督陆建瀛进呈新刊《御纂性理精义》、《圣谕广训直解》，得到清廷嘉纳。咸丰帝颁发上谕，重申“经正民兴”的意义，要求各地方督抚务当实力奉行。谕中称：

我皇考曾命儒臣恭闳《圣谕广训》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，编撰四言韵文，颁行各省，启发愚氓。朕思《性理》诸书，均为导

①《十朝东华录·道光朝》卷四十，光绪年间上海积石书局石印本。

②何绍基：《道州重修学宫记》，《东州草堂文钞》卷三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刻本。

③汤金钊：《重修句容县学记》，《寸心知室存稿》卷六，咸丰元年刻本。

④曾国藩：《讨粤匪檄》，《曾国藩全集·诗文》，232页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95。

民正轨，著各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飭地方官及各学教官，于书院、家塾教授生徒，均令以《御纂性理精义》、《圣谕广训》为课读讲习之要，使之家喻户晓，礼义廉耻油然而生，斯邪教不禁而自化，经正民兴，庶收实效。各该督抚等务当实力奉行，毋得视为迂阔具文，日久生懈，则风俗人心蒸蒸日上，朕实有厚望焉。将此通谕知之。^①

后又刊发《钦定满汉文大学衍义》，以敦教化。

太平天国起义如同当头棒喝，引发了朝野上下对于既往政策的思考。咸丰、同治之际，不少士大夫追寻祸源，将之归结为文化原因。吴廷栋认为：“近日吏治之坏，人才之衰，积习既深，蔽锢日甚，非大励廉耻之防，从人心挽回，岂能遽望转移。推原其故，正由正学不明而积渐至此也。”^②而救急解困之法，则在于明正学术、端正人心。他们非常明确地指出：“正风俗以厚人心，实为救时之亟务；而兴教化以端士习，则又救时之要图也。”^③“异端横行，邪说害正，在今日只有反经之一法。”^④

进入同治朝后，太平天国起义的高潮已过，清中央政权有暇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文化政策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三月初，曾任顺天府尹的蒋琦龄上《中兴十二策疏》，较为系统地表述了对于时政的看法，建议“崇正学以兴教化”，“退孔、郑而进程、朱，贱考据而崇理学”。他认为，“处多事之秋而高谈理学，鲜不以为迂矣。岂知世之治乱，原于人心风俗，人心风俗原于教化，教化原于学术。正学不明，欲以

①《文宗显皇帝实录》卷二十三，《清实录》第40册，335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6。

②吴廷栋：《答宋雪帆阁部书》，《拙修集》卷八，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本。

③刘蓉：《致某官书》，《养晦堂文集》卷三，光绪丁丑思贤讲舍刻本。

④贺瑞麟：《清麓日记》卷三，光绪二十五年刘传经堂刻本。

施教化，厚风俗，致太平，必不可得矣。是学术者，政教之本也。”他指出，康熙朝国运昌盛，是由于“一以程、朱为归”，正学昌明之故，而乾、嘉以降江河日下，则是由于不讲理学之故，因此，“欲正人心、厚风俗以图太平，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。则曷不仰法圣祖，提倡宗风，退孔、郑而进程、朱，贱考据而崇理学”。^①蒋琦龄的奏陈得到清政府重视，三月下旬，同治帝谕示天下，要求各直省切实加强程朱理学的宣扬与教化。谕旨说：

我朝崇儒重道，正学昌明，士子循诵习传，咸知宗尚程、朱，以阐圣教。惟沿习既久，或徒骛道学之虚名，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，未能研求，势且误入歧途，于风俗人心，大有关系。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，凡校阅试艺，固宜恪遵功令，悉以程、朱讲义为宗，尤应将《性理》诸书随时阐扬，使躬列胶庠者，咸知探濂、洛、关、闽之渊源，以格致诚正为本务，身体力行，务求实践，不徒以空语灵明，流为伪学。^②

需要指出的是，清政府在表彰理学的同时，并没有对汉学示以冷落，而是提出汉学、宋学理无偏废的主张，表明汉学亦在“正学”之列：“至郑、孔诸儒，学尚考据，为历代典章文物所宗，理无偏废。惟不得矜口耳之记诵，荒心身之践履。”^③至此，清政府的文化政策由乾嘉时期的重汉轻宋，复明确变为以宋为重、汉宋兼采。

①见朱克敬：《儒林琐记·雨窗消意录》，51～53页，长沙，岳麓书社，1983。

②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二十二，《清实录》第45册，609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。

③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二十二，《清实录》第45册，609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。

为推行其文化政策，同治朝采取了多种措施。如同治元年年底，清政府先后下诏敦促国子监祭酒、各省学政切实讲明正学，端正士风。上谕中明确要求提高程朱理学在太学教育中的地位：

太学为自古培植人材之地，我朝振兴庠序，加意教育，世宗宪皇帝赏给庠银，增辑黉舍，首善之区，四方观瞻所系，必得如唐之韩愈、宋之胡瑗，躬行实践，讲明正学，以为表率，人材自能蒸蒸日上。乃近来国子监专以文艺课士，该祭酒等既以是为去取，而士子亦复以是为工拙，于造就人材之道何裨焉？著嗣后于应课诗文外，兼课论策，以经、史、《性理》诸书命题，用规实学。并著该祭酒等督飭各堂助教、学正、学录，分日讲说，奖励精勤，惩戒游惰，黜华崇实，以端趋向。^①

同时，广泛刊印《钦定满汉文圣谕广训》，并飭令各级教官务求实践，切实承担起地方的宣传教化任务：

自来储才养士，必视学校为盛衰。我朝列圣相承，庠序修明，敦崇实学。皇考文宗显皇帝御极之初，即命生童就试者兼习《性理》等书，原冀其趋向一端，则学术自正，以收化民成俗之效。乃近来各省教职等官，并不实力奉行、认真训课，惟知索取贽礼修仪，贪得无厌；又其甚者，往往干预地方公事，并或遇事鱼肉士子，谄谀绅富，又安望其经明行修，足为士林表率耶？嗣后各省学政务当整躬率属，督飭各教官读书立品，毋为士子所轻。平时训导诸生，总以躬行实践为归，勿崇尚浮华，勿虚应故

^①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五十二，《清实录》第45册，1422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。

事。……并飭各教官分日于该处城乡市镇，设立公所，宣讲《圣谕》，务使愚顽感化，经正民兴，正学昌明，人才蔚起，实有厚望焉。^①

清廷还任命倭仁为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以导风向。倭仁负责制定的《翰林院条规》六条，实际上就是加强理学修养、培养正学风气的规程。

同治帝本人，亦以倭仁、李鸿藻等理学名臣为师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清廷颁布上谕，以“古今治乱得失之源，圣贤身心性命之学，莫备于经，君临天下者，所当朝夕讲求”，令倭仁、贾桢等选派翰林，择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中切要之言，“衍为讲义，敷陈推阐，不必拘泥排偶旧习，总期言简意赅，仿照《大学衍义》体例，与《史鉴》互相发明，将来纂辑成书，由掌院学士装帙进呈，以备观览”^②。

至同治年间，清政府的学术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，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。这表现在：其一，理学名儒地位提高。庙堂之上，“正人立朝”，宗主理学的倭仁、李棠阶、李鸿藻、徐桐、吴廷栋等荣登权要；封疆大吏中，湘军集团以曾国藩、左宗棠居首，形成一个庞大的宣讲理学的士大夫群体。同时，民间的理学名士受到褒奖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安徽夏忻因嗜好理学，“年届耄耋，笃学不倦”，而得受朝廷褒扬，并将其所著《恭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》交由武英殿刊行全国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陕西名儒贺瑞麟、山西名儒杨树椿、薛于瑛也因传授正学有功，得赏国子监学正銜。其二，理学书籍得以

^①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五十二，《清实录》第45册，1423~1424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。

^②《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一百零二，《清实录》第47册，250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7。

大量刊刻。乾嘉年间，汉学流行，书坊之中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无人市易^①。这一时期，除清政府成立的官书局刻有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朱子全书》、《圣谕广训》等大批宣传程朱理学的书籍外，民间也有不少热心于刊行理学著作。如安徽六安涂宗瀛不仅刊刻有程、朱等前朝理学家的文集、语录，还亲自校刊了当代理学名儒如罗泽南、倭仁、吴廷栋、方东树、何桂珍等人的主要理学著作。书籍品种的前后变化，正是学术风气和文化政策的某种体现。

（二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学术文化政策

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，是晚清历史的分水岭，也是清政府调整学术文化政策的重要界标。它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清政府的文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迫使其作出调整。

一方面，中日甲午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。梁启超曾说：“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，实自甲午一役始也。”^②何启、胡礼垣也说：甲午“未之战也，千人醉而一人醒，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醢，宜其醉醒无时也”，但“一战而人皆醒矣，一战而人皆明矣”^③。这场战争创巨痛深，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自觉，民主主义开始成为思想界的潮流。以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蓬勃兴起，猛烈冲击着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。清王朝不得不继续加强文化专制统治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。

另一方面，甲午一役，丧权辱国，“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，任

①昭槱：《嘯亭杂录》，317～318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0。

②梁启超：《改革起原》，《戊戌政变记》附录一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一，113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9。

③何启、胡礼垣：《新政始基》，《新政真论》，183页，沈阳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。

与国之取求，四万万人如阶下囚，听外人之笑骂”^①。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，使其认识到不变法图强、学习西方，势将有亡国灭种之灾。虽然此前先后有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，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自觉，更不可能使清政府认识到局势的危急。“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，再经甲申马江之变，而十八行省之民，犹不知痛痒，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，直待台湾既割，二百兆之偿款既输，而鼾睡之声，乃渐惊起。”^②甲午战争后，朝野变法自强的呼声高涨，清政府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，开始重视西学的价值。

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，甲午战争之后，清政府明确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作为官方的文化政策。

从思想史角度考察，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就出现了“师夷长技”、学习西方的思想。其后，冯桂芬提出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。举办“洋务新政”的同治年间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虽不脱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范畴，但未作如是概括，清政府亦未明确以之为文化政策。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情况有所变化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七月，孙家鼐在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》中论及办学情形时，提出要以“中体西用”为宗旨。他说：

中国五千年来，圣神相继，政教昌明，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，尽弃其学而学西法。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，自应以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；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；中学有未备者，以西学

^①何启、胡礼垣：《新政始基》，《新政真诠》，182页，沈阳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4。

^②梁启超：《改革起原》，《戊戌政变记》附录一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一，113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9。